

# 歐共主義何處去？

尹慶耀

專欄作家雷威爾 (Jean-Francois Revel) 在他所撰「歐洲共產主義的神話」一文中，有過下列幾段話：「當我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三次訪問美國時，我發現，如果某人對歐洲共產主義或一般共產主義抱批評態度，他就會受到學術界和自由派報紙的懷疑。借用一句流行的口頭禪說，那就是『恢復冷戰』」。「在極權主義到處泛濫的時候，美國人居然視若無睹。祇有和解與歐洲共產主義值得他們尊敬，而按其表面價值予以接受」。「在民主國家中懷疑任何政黨的競選諾言，原被視為公民基本權利，但是懷疑歐洲共產黨（特別在美國），就被視為思想保守」<sup>①</sup>。

筆者認為，不管美國人口裏願不願意講明白，但絕大多數人心裏還是反共的，只是他們的反共政策常常改變。「麥加錫主義」、「杜勒斯主義」，是曾經受過擁護的，但曾幾何時，它們竟已成為嘲諷的對象！進入七〇年代，美國倡言談判、「低盪」。它承認與共黨國家有歧見，聲言願為這些歧見談判，避免為歧見作戰。美國一方面與蘇聯「低盪」，一方面希望用中共牽制蘇聯，並希望由歐洲共產主義者帶頭脫離莫斯科。這種政策有反蘇不反共之嫌，如果蘇聯的擴張不能遏止，歐洲共黨逐漸壯大（中共正為內外問題所困，難以壯大），其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國家，享受着長期的安定繁榮，共黨勢力原已式微。惟在此一環境下長期執政的某些政黨（如義大利的基民黨），難免孳生官僚主義，缺乏行政效率，一遭遇到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以來的經濟不景氣，就感到窮於應付。再則七〇年代以來的東西「和解」，也間接影響到政黨間的妥協，使得歐洲共黨得以藉「左翼大聯合」的策略伸張其勢力，並以歐洲共產主義為標榜，以求改變共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而一般不滿現實的人民，自然也有若干人寄望於左翼政黨，希望他們能出來改變一下現狀。然而，如果西方先進國家中，竟有一個共黨政權出現，其影響如何？北約成員國之中，竟有共黨政權參加，豈不

註① 「歐洲共產主義的神話」，原載一九七八年一月號「外交季刊」。

連反蘇也成了問題？這正是過去季辛吉所以表示關心的緣故。

最近美國國內的保守勢力有抬頭之勢。日本若干「左」過頭的政黨正作「中道」修正。加拿大的克拉克取代了杜魯道，英國的余契爾夫人代替了加拉漢，西德總統選舉中保守派的候選人獲勝，盧森堡大選中那中間偏左的政府宣告失敗。最近，歐洲議會選舉中間偏右的勢力超過半數。與此同時，作為歐洲共產主義代表的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共黨，却連連遭到挫敗。

假如八〇年代西方政治風向在右轉，那麼歐洲共產主義又該往何處去？這似乎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 二

一位美國學者 W.Griffith 給歐洲共產主義下的定義是：歐共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改革派，與列寧主義相反，強調由左派勢力的廣泛聯合，通過議會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它尊重人民自由、多黨體制以及輪流執政原則。歐共主義更特別強調，各個共黨的獨立性，不受蘇共的節制<sup>②</sup>等等。

依照英國作家克蘭克紹 (Edward Crankshaw) 的說法，從一九六八年<sup>③</sup>以來，布里茲涅夫就想對西歐共黨嚴加控制，他竭力主張召開歐洲共黨會議，企圖促成它們的團結並奉蘇共為盟主，但此項會議却遲遲未能舉行。

一九七五年七月西班牙共黨總書記卡里略 (Santiago Carrillo) 訪問義共，與義共總書記貝林格 (Enrico Berlinguer) 發表共同聲明，倡言「在自由的對立與統一的基礎上，採行多黨體制，尊重勞動工會的自主性，尊重宗教的自由與言論、文化、藝術的自由」。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共和義共在羅馬發表共同聲明，主張「排除外國（意指蘇聯——筆者）干涉，通過各自國內的民主制度以獲取政權」。它們認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始終應在經濟、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範圍內求其實現。一九七六年六月義大利大選，義共獲勝，大有問鼎政權之勢。同月間，義共總書記貝林格訪問法共，他和法共總書記馬歇 (Georges Marchais) 於三日晚在巴黎一項共黨集會中，說明兩黨共同的立場：「蘇聯、東歐型的共產主義，從任何意義來說，都不能照樣適用於西歐各國」。馬歇於說明義大利大選結果對共產黨具有重大意義之後聲言：「法義兩國共黨認為與社會黨的共同行動，與所有民主的進步政黨的共同行動，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蘇共積極主張的歐洲共黨會議，終於同年六月底舉行，但歐洲共黨抵制蘇共的操縱，反對將中共逐出共黨世界的盟主。在它們商量這項抵制的時候，才開始有人使用「歐洲共產主

註② 轉自奧卡 (Takashi Oka) 「歐共主義·木馬計？」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一九七七年一月五日)。

註③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率五個華約國軍隊侵捷，壓服捷克自由化運動，西歐共黨多予抨擊。對「布里茲涅夫主義」即「有限主權論」，尤感深惡痛絕 (影響歐共競選)。

義」這個名詞<sup>④</sup>。一九七七年三月二至三日，義共、法共及西共三黨領導者在馬德里集會，會後發表宣言，其要點爲：(一)義共、法共表明與西共團結一致，呼籲西班牙政府全面大赦政治犯；(二)重申「歐共」希望多黨社會，尊重民主自由（包括宗教自由、自由商業聯合、多數統治）；(三)呼籲整體地應用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宣言所標榜的東西和解與人權<sup>⑤</sup>。同（一九七七）年四月卡里略發表其「歐共主義與國家」（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一書，於是歐共主義一詞就更加確定了。

顧名思義，歐共主義應指歐洲共黨而言。惟一九七五年九月義共代表團應邀訪問日共，一九七六年三月卡里略又應邀赴東京與日共會談，四月間馬歇亦前往訪問，這些訪問團與日共所發表的共同聲明，大致與前述歐共立場相同，因而日共也自願廁身歐共主義者之林，但這是十分勉強的。

## II

歐洲共產主義與蘇式共產主義究竟有什麼不同呢？依照中共的解釋，蘇共「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爭得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sup>⑥</sup>。這條道路在西歐是絕對走不通的，於是歐共主義的特色之一就是標榜脫離莫斯科路線。

首先，歐洲共黨得捨棄暴力革命路線，尤其內戰式的革命方式。列寧早在第二國際時期就主張帝國主義戰爭不可免，堅決主張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現今的共黨政權中，有絕大多數都是共黨趁其政府對外戰爭疲憊之際，攬起內戰式的叛亂而奪取政權的。史達林在臨死的前一年，依然強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他只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鬭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願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爲劇烈」<sup>⑦</sup>。這顯示他希望蘇聯自己能够不必捲入戰爭。同時，他指出共黨所操縱的國際和平運動，也只能將世界大戰推遲而不能避免，想來他仍然希望各國共黨能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趁機奪取政權。回憶一九四七年十月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成立時，即曾將義共、法共包括在內，但這兩個西歐共黨的暴力革命環境，不久即成過去。南斯拉夫叛離莫斯科後，曾唱出「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黑魯曉夫於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蘇共二十次大會中，也承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多樣化」道路，並提出在議會中獲取「穩定的多數」的革命方式，而爲中共所激烈反對。但現今像中共那樣堅持暴力革命的主張，或許在第

註④ 克蘭克紹撰「歐洲共產主義之意義與緣起」，原載（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一日）「紐約時報」雜誌。

註⑤ 甘德曼（J. Gandelman）「歐共路線的出現」，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七年三月四日）。

註⑥ 「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中共「兩報一刊」（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二日）爲紀念列寧誕生一百週年而作。

註⑦ 一九五二年史達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七月）第四版（一九七一年三月）第十六次印刷，二七頁。

三世界國家的共黨中，還有若干支持者。至於西歐共黨，它們已憬悟到它們不僅不是身處在俄國，而且也不在一九一七年，在西方先進工業社會裏，再不容易存在暴力革命主張的市場了。換言之，它們必須走「議會道路」。

#### 四

「議會道路」是通過選舉進行的，爲了爭取選票，共黨必須使自己的政見適合選民的需要。蘇聯現今雖然自稱「全民國家」，但在布里茲涅夫的「新憲法」（一九七七年）上，它仍然受「全民黨」（共黨）的指導與控制。在若干場合裏，蘇共仍然強調其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說穿來，克里姆林宮仍然是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但這樣的政權早已聲名狼藉，爲西方人民所不能接受，於是歐洲共產主義的另一特色是宣布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承認多黨體系，根據選舉結果作政權交替，並聲言尊重人民的自由。

在西歐，像發展得較遲緩的西班牙，在一九六〇年代也享受過一段經濟繁榮。當人民生活安定富裕時，他們會嚮往民主自由，而不歡迎什麼暴力專政。但西歐共黨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有着一些共同點，尤其在西共與法共之間是如此。例如，它們決心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都在一九六八年，而公開宣布又都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卡里略在東京記者會上聲稱，西共早在八年前就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教條。事實上，西共明白打出「民主主義路線」的旗幟，確係始於一九六八年捷克事變時。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起，法共舉行廿二次大會，馬歇在演說中稱，下屆大會將修改黨章前文，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那一點。另一位法共理論家說，經過了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革命」（工潮、學潮）之後，法共於同年秋就已決定了自己到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顯然，捷克事件給予西歐共黨的刺激是強烈的，而一九七五年蘇聯支持葡共的强硬路線，再度鼓吹無產階級專政，在歐洲留下極爲惡劣的印象，也迫使西歐共黨有需要公開聲明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於是，一九七六年這一年，就成爲歐洲共產主義這個名詞盛行一時的年月。但義共並未公開作此宣布，它自認從開始它就沒有竭力作如此主張，因而也就談不到放棄。本來，義共第二任總書記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義共第八次大會時，提出過「結構改革論」，那和黑魯曉夫通過議會中「穩定的多數」實現社會主義政策的構想差不多，但它是出自義共本身的主張，雖然提出的時間稍遲於黑魯曉夫。此外，義共不太喜歡作過激的言論，也是它的一種傳統性格。

然則，歐共如選舉獲勝而掌握政權，它們究竟要建立怎樣的一種政治體制，由於沒有先例可循，那是頗難預測的。在第三國際時代，各國共黨業已遵照一九二〇年七、八月間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加入國際的二十一條件，成爲共產國際某國支部，且經一九二四年七月第五次代表大會決議，各國共黨都「布爾什維克化」。它們現今已完全擺脫這些「傳統」的影響了嗎？沒有。正是爲此，克蘭克紹才認爲，祇要西歐共黨還遵循所謂「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局高高在上，提名並控制中央委員、黨部書記

、各組以及出席大會的所有代表），則反史達林主義就是一句空話。事實上，民主集中制乃是嚴格遵守列寧史達林式的組織路線，上級意見按照政治局的安排作虛偽的討論，結果是中央委員會全體無異議通過。雷威爾氏指出，法共和義共就從未違背過這種原則。此種情形，使人不禁發生下列疑問：如果法國成立聯合政府，容納共黨，共黨部長究竟聽從誰的命令？總理的？總統的？抑或他們自己政治局的？依目前情形看，無疑的，他們是聽政治局的。共產黨的作法是反代議民主的，也抵觸憲法<sup>(8)</sup>。

## 五

作為歐洲共產主義者代表的義共有黨員一七〇萬，法共黨員七〇萬，西共黨員一〇萬，爲了在選舉中獲勝，不能不與左翼政黨和其他勢力聯合，這也違反了第三國際的傳統。

顯然是由於列寧的影響，第三國際（共產國際）一向把第二國際系統下的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看作敵人。儘管一九三五年第三國際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對統一戰線作了有名的決議，但共黨並未誠心與社會黨等聯合，乃其效果不彰的最大原因。

早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至十一日，西歐的比、丹、西德、荷、法、希、義、盧、挪、奧、西、瑞士、瑞典、西柏林、塞浦路斯等共黨（葡共未出席，僅提書面意見），在維也納集會時，即提倡反獨占大聯合。那是一種廣泛的統一戰線。

根據蘇共的說法，當時法共已同社會黨黨員及其他左翼黨派採取一致行動。義共則同主張無產階級團結的社會黨保持牢固聯盟，並同天主教內部的許多左派加強聯繫。芬共於選舉中，同許多地區社會民主組織的左翼採取了統一聯盟，芬共黨人參加了政府，而社會民主黨領導了政府。西德、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共黨當時仍處於地下，它們正爭取左翼力量的團結一致，尋找能够找到的同盟者，擴大自己的隊伍和它們在羣衆中的影響力<sup>(9)</sup>。

從統一戰線的觀點看，蘇共當時並未反對這種聯合，惟因歐洲共黨本身力量有限，在六〇年代內，這種左翼大聯合的策略，並未發生實際效果。情勢的改變，是始於七〇年代。

一九七二年六月，法共與法國社會黨以「共同政策綱領」爲核心結成聯盟。一九七三年義共倡言「歷史妥協」，主張以所謂革新勢力（即左翼勢力）與天主教的妥協、協調爲中心，重整政治戰略。它認爲經由人民之手從事社會的變革，較之由勞動者奪取政權，更爲重要。一九七四年中期，西共以「民主評論會」爲軸心，採用民主勢力共鬪方式，並對當時葡共的過激作風予以抨擊。湊巧的是，這些都發生在東西「和解」和石油危機時期，而歐共的勢力也乘機抬頭。

註⑧ 「歐洲共產主義的神話」。

註⑨ 原係「真理報」文章中透露，莫斯科電台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廿日用華語摘要播出。

當然，這些「聯合」仍不脫「統一戰線」的窠臼，但聯合的範圍却較以往更加廣泛。義共從陶里亞蒂時期就倡言與天主教勢力聯合。這自然與梵蒂岡在義大利選民中的影響力有關。西班牙也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因而西班牙共黨也聲言：「我們必須珍視傳統的天主教文化。如果出自人民的願望，我們也贊成國王制度的繼續存在」。必須說明，梵蒂岡是堅決反共的，但歐共拉攏天主教內左翼份子的策略，也並非沒有成就。正是爲此，歐共主義者在聲言尊重人民種種自由時，也把宗教信仰自由列入其中，這和無神論的共黨傳統精神不合，倘使它們有一天真的當政，其對宗教的態度如何，頗難逆料。但至少在目前這個階段，天主教勢力也還是它們聯合的對象之一。

## 六

義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拿坡利塔諾 (Giorgio Napolitano) 在一篇文章裏寫道：「我們（義共）認爲公營經濟部門不應該擴張，義大利的公營事業範圍已够大，政府以直接控制一部分的生產和財務工具、財務政策和獎勵等方式，足以影響全國投資和發展的方向。我們深信義大利共產黨的目標不在於使生產工具（或稱生產資料——筆者）全部歸於國有。在工業化的西方式經濟裏，這不是達成社會主義目標的必需條件。對於私人事業或甚至大規模的私營工業，以及利潤和市場經濟的作用，不容否認。今日義共政綱的特色，在於不使經濟發展成爲自動自發的活動；堅主對『盈餘』的利用加以民主管制；由民主的公共權力指導社會及經濟轉變，以保證發展新品質的廢續，而不僅僅求穩定的全面成長。」<sup>10</sup>

拿坡利塔諾特別提出來說，「時常有人批評義共的經濟建議是『凱因斯式』的，含有正統的貨幣理論的味道。我（拿坡利塔諾）要加以說明的，是我們不認爲從馬克思主義裏可以發掘出詳細的計劃，馬克思祇告訴我們如何分析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矛盾，並描繪出資本主義將來的危機，會被歷史淘汰。像義共那樣的馬克思工人大黨，對於克服這些矛盾，應該有具體的貢獻，而這些矛盾導致了我們社會和經濟危機。我們必須時常記住我們的目標，因危機而受損害的不僅是人民大衆，反之，人民大衆應該能够看出使工人和國家走上真正進步的道路。這樣，無須坐待資本主義垮台，工人運動應該能表現出有管理社會和改造社會的能力」<sup>10</sup>。

從右引拿坡利塔諾的兩段話中，我們看不到義共已放棄馬克思公有財產制的理想。他只是要工人運動（自然由共黨代表——筆者）不待資本主義垮台，現在就參加管理並改造社會，這是合乎「結構改革論」的傳統的。至於他說公營範圍已經够大，是由於從法西斯政權以來，義大利就實行獨特的混合經濟體系，其基幹產業已有五〇%至一〇〇%國有化。早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

註<sup>10</sup> 拿坡利塔諾作「義共看義大利危機」，係根據其在哈佛和耶魯大學談話寫成，原載美國「外交季刊」（一九七八年七月號）。

日義共發表的競選綱領中，就聲言義共在經濟方面，並不要求將公共部門無限制擴大，公營部門已經够多了，也沒有重編或更新的必要。義共承認私營企業自由的主動權（initiative），它可以爲了利潤目的、基於市場需求而自由營運。要緊的是，國家的發展前途，不能由大獨占集團的利害、選擇，來加以條件限制。前引拿坡利塔諾的文章，也不出這個範圍。當然，我們應該把這看成義共當前的綱領。

法共主張所有的重化學工業、銀行、保險業要國有化，在國家計劃的範圍內，私人企業家可以保有若干決定權。至於西共，在經濟政策方面，主張將大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業勞動者與公共團體，銀行、保險業等要國有化，要確立勞動者共同「參加」決定的制度。

若干人士說，蘇聯實行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卡里略在所著「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一書中說：「在蘇聯發展起來的這種國家，既不是資本主義，因爲它沒有保護個人財產，但也不是列寧想像中的那種國家——即工人直接行使權力。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稱呼這種國家呢？列寧說過，在社會主義第一階段，國家將保持資產階級份子，但蘇聯國家遠遠超逾列寧的規定，不僅保持着資產階級份子，還蛻變和墮落至有時只能與帝國主義連在一起的程度」<sup>⑩</sup>。

卡里略的話或許有些刻薄，但蘇聯現今不能稱爲社會主義國家當無疑義，那麼其他共黨在經濟主張方面與蘇聯不盡相同，也就不能視爲離經叛道。而且，迄今還沒有一個共黨宣布要放棄公有財產的理想，也沒有一個共黨像一九五九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那樣，公開宣布放棄階級政黨的立場，與馬克思主義絕緣。甚至在一九七六年六月的歐洲共黨會議中，各黨爭吵激烈，惟會中通過的最後文件裏，依然鼓吹「和平共處絕不意味着維持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現狀」。這句話是頗耐人尋味的。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裏，最後一句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呵」！一九一九年，托洛茨基爲第三國際成立所寫的宣言末尾是：「在第三國際旗幟下，全世界工人們聯合起來呵」！所謂共產黨自始就是個國際性政黨，強調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取代民族主義，這是盡人皆知的。

現今蘇聯仍然強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或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但蘇聯把國際主義解釋成保衛、加強和支持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這會使人想起宣稱蘇聯有權「以軍事援助兄弟國家來消除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的「布里茲涅夫主義」。而蘇共指反蘇即是反共，這項理論也不能爲其他共黨接受。

註⑩ 轉自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第二張「天下」欄。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二日馬歇聲稱：「法共政策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巴黎決定」。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法義共共同聲明：要「排除外國干涉」。一九七六年三月卅一日卡里略在日本宣稱：「現今從無產階級國際團結觀點看來，各國共黨所最需要的是在各自國家內實現社會主義，不能只依從特定國家的指示」。同年六月歐洲共黨會議最後文件中沒有「國際主義」字樣，會議期中並未唱「國際歌」。

各國共黨之避免強調國際主義，顯然是爲了擺脫蘇聯的干涉與控制。不過，卡里略曾經說過：如果莫斯科早一點攻擊他，在西班牙大選中，他還能獲得更多選票<sup>⑫</sup>。如此說來，歐洲共黨攻擊蘇聯和引起蘇聯反攻，都可視爲爭取選票的一種手段。

在一九七六年也是歐洲共產主義甚囂塵上的一年，西、義、法、英、日各國共黨，不斷有國際性的互相訪問，而義共中委魯畢更曾聲稱：「儘管我們遵守議會主義，但我們並非社會民主主義者。我們和他們歷史不同，意識形態有異。例如，共產黨是勞動階級、農民及一部分中產階級的黨，爲了實現和平、緩和緊張情勢、裁減軍備和經濟合作，我們重視和世界共黨的國際團結，而社會黨和社民黨並不如此」<sup>⑬</sup>。

一九七九年「五一」勞動節當日，莫斯科電台播發蘇聯國際政治聯合會副主席達荷那查耶夫（音）的談話，主題是「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團結」。在這篇談話中，他強調蘇共中央「五一」節的傳統口號，就是加強全世界共產黨人的團結一致，並且指出現今共產黨的定期協商和會議，就是團結合作的形式。他承認目前各黨可自己決定其政策與策略，沒有一個國際中心來約束、限制。他強調蘇聯革命經驗的重要，且引述英共總書記麥克里南（Georges Gordon McLennan）的意見，認爲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就，民族解放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鬭爭的高漲，在創造不經「內戰」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達荷那查耶夫還聲稱，蘇共是最初聲明有可能通過和平途徑向社會主義過渡者之一。他又說，布里茲涅夫同志強調指出：世界共產主義，只有作爲統一的國際運動行動起來，才能達到自己的偉大目標，而這些目標就是和平和全人類的幸福。

蘇共已放棄重建國際中心的願望，但仍不斷強調團結合作，對歐共主義加以抨擊。但在行動上，它却是相當容忍、謹慎。事實上，歐共從不曾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加以責難，包括蘇聯在安哥拉、衣索匹亞等地區的擴張在內。據悉，一九七七年三月馬德里會議中，貝林格就堅持在宣言中不提蘇聯境內的人權問題<sup>⑭</sup>。照克蘭克紹氏的說法，歐洲的共黨對於俄國人祇有一個用處——使西方盟國個別與集體地容易受到顛覆，而在俄國仍需要先進國家援助時，不要作得太過火而把整個歐洲鬧得混亂不堪<sup>⑮</sup>。倘使此

註<sup>⑫</sup> 「歐洲共產主義之意義與緣起」。

註<sup>⑬</sup>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第一面「西歐的新浪潮」（二）。

註<sup>⑭</sup> 「歐洲共產主義的神話」。

註<sup>⑮</sup> 「歐洲共產主義之意義與緣起」。

說可信，則只要歐共不太損及蘇共的威信，歐共主義的存在應該是蘇共所能容忍的。

## 八

以上我們析述了一些與歐共主義特色有關的問題，以下且敘述一下歐共的實力與現況：

西共是一個小黨，黨員十萬人，在國內擁有的選票不過百分之九，一九七七年四月才成為合法政黨。但它的總書記卡里略可是歐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批評蘇聯，言詞激烈，以致一九七七年赴莫斯科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六十週年紀念，被蘇共禁止其發表演說。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至廿三日，西共召開內戰以來也是合法化以來的首次大會——第九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一、五〇〇人。廿一日，大會通過中委會提案，將該黨性質由「馬克思列寧主義黨」改為「民主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黨」。其理由是「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色彩過濃」，因而予以刪除。該案以九六八票贊成、二四八票反對、四〇票棄權表決通過。然而，事實上這項修正並不像表面上那麼容易。

雖然早在一九七六年一月西共就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但從黨章上刪除「列寧主義」却受到下級黨部的抵抗。馬德里地區黨部經過一年多的討論，贊否兩派意見分歧，經卡里略親自說服，才勉強接受了中委會提案。在巴塞隆那地方黨部，贊成維持列寧主義的九七票，反對的八一票，而這個以「統一社會黨」名義出現的地方共黨組織，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大選中得票率一八%（共黨在全國得票率九%），這是不容忽視的現象。據悉，西共黨內暴力革命派仍儼然存在，最近且已表面化。另一方面，卡里略雖在九大中繼續當選總書記，但一部由喬治·笙浦隆寫的書中，却指卡里略過去是頑固的史達林主義者。這本書的書名是「費德里科·桑德士自傳」，書中說卡里略對於進入六〇年代獲致高度經濟成長的西班牙缺乏瞭解，作了錯誤的情勢分析。共黨執行部對佛朗哥主義的抵抗力評價過低，對人民蜂起的可能性又估計過高，因而組織一些無用的罷工，犧牲了衆多的鬥士。一九六三年共黨的國內負責人朱里安·格里莫被逮捕，在全世界抗議中被處死。該書又稱，一九六四年時，卡里略鼓吹各國共黨應該團結在莫斯科周圍，力主政治警察和勞動營是必要的。就在這一年，費德里科·桑德士因為主張「佛朗哥主義」，布爾喬亞主義，可能改變支配形式，徐徐地、和平地成為『多多少少有些民主』的體制」。當時他竟和黨內二號人物費南特·克洛丹同時被開除黨籍。卡里略如此排除異己，正是史達林主義的特質。該書作者認為西共迄未承認過去的錯誤，拒絕作自我批判，沒有真正的改變，它之被稱為歐洲共產主義，是值得懷疑的<sup>⑩</sup>。據說這本書很快就銷到二〇萬部以上，成為暢銷書。旁的問題可姑置不論，單就一個史達林主義者搖身一變而成為歐共主義者而言，則歐共主義的真正價值就不能無疑了。

註<sup>⑩</sup>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八年二月七日）第四面。

西共於一九七七年三月大選中挫敗，四月地方選舉時因與社會黨聯合，在大都市中有所伸張，然亦微不足道。

克蘭克紹氏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舉行第二次中共會議時，中共指責黑魯曉夫搞修正主義。當時，歐洲共黨表面上為黑魯曉夫撐腰，指控中共故步自封，實際上是趁機提高自己的獨立地位。瑞典共黨書記海格柏（Hilding Hagberg）說，重複列寧的話而不注重列寧時代以後的改變，並無意義。他和其瑞士同僚還宣稱，他們發現無產階級專政（仍是一個神聖而未被質疑的名詞）的一切說法，不合時代而且乏味。甚至一向對莫斯科忠心耿耿（也許因為他恨義共的關係）的法共多列士（Maurice Thorez）也同意這種意見。義共代表隆哥（Luigi Longo）繼續陶里亞蒂的路線，在支持莫斯科、攻擊中共異端邪說掩護下，對改良派與修正派的途徑大加讚揚。瑞典共黨書記又一次比較坦白的說，共黨與其最痛恨的敵人（比痛恨右翼政黨還要深）——社會民主黨之間，應該和解。他說瑞典共黨已經決定，永遠放棄與當政的社會民主黨鬭爭，他們正致力於兩黨合而為一<sup>⑯</sup>。

從右引資料看來，歐洲共產主義可說是其來有自。但若干共黨的真正改變，不是始自老一代的布爾什維克，而有待新一代的領導者。法共在前第一書記多列士領導下，仍難免有「莫斯科的婢女」之譏。法共的左翼聯合（社會黨、共產黨、左翼急進運動）要到七〇年代才發生作用，到一九七六年法共廿二大時，總書記馬歇倡言「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才成為歐共主義之一員而與莫斯科道別。在一九七三年的大選中，左翼聯合勢力伸張，使執政的保守勢力大受威脅。但這次選舉後，情勢頗有改變。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三日法國社會黨、共產黨、左翼急進運動（急進左派）三黨首腦會談企業國有化及國防政策問題，結果未達成協議。此後社、共兩黨互相責難甚至作人身攻擊，達半年之久。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為了防止左翼聯合勢力在當時大選的第二次投票（第一次投票已於十二日舉行）中失敗，社會黨領袖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左翼急進運動委員長法布爾、共黨總書記馬歇在社會黨總部會談，發表了一項共同宣言，表示和好，但宣言雖提到具體實施「共同綱領」，對於最大爭執的企業國有化範圍則未曾觸及。同月十九日第二次投票結果，議會席位分配如左：

執政中間聯盟		左翼反對聯盟	
戴高樂派	一四八	社會黨	一〇三
法國民主聯盟	一三七	共產黨	八六
其他	六	激進左派	一〇
總計	一一九一	極端左派	一一〇〇

註<sup>⑯</sup> 「歐洲共產主義之意義與緣起」。

這次大選的失敗，使得社共兩黨又相互攻訐而走向分裂。按法共現有黨員七〇萬，掌握全國選票百分之二〇，而法國社會黨則掌握選票百分之三〇。馬歇自忖要想控制一個聯合內閣，他的黨還不够强大，故爾轉變策略，重回不妥協的老路線。上述選舉過後，義、西共黨曾指摘法共是有意輸掉，想來不爲無因。

法共與社會黨六年結盟期間，衆多黨員在意識形態上發生動搖。一九七八年三月選舉失敗後，有百分之一〇——一五的黨員脫黨，迫使法共不得不檢討其結盟政策。一九七九年五月九至十三日，法共在巴黎舉行第廿三次大會，馬歇在開幕詞中承認，過去六年間與社會黨採同盟路線，是一項「錯誤」。他指摘社會黨以左翼甚至極左的言詞掩飾它的右翼路線，以進行欺騙。馬歇言詞之激烈，表示法共將與社會黨訣絕。馬歇又聲言：「歐洲共產主義並非是新的『中心』，也不是新的典範」。他對歐共主義，只強調其「自主性」與「不干涉」二點。此外，他在開幕詞中聲稱：「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不像右翼政權那樣暴虐」。他對蘇聯、東歐作如此高度評價，似大有向蘇聯「回歸」之勢。由波諾馬寥夫（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主管國際共黨事務）率領的蘇共代表團，於聆聽馬歇在大會的講話後，深表歡迎，在致詞中多有感謝之意，並邀馬歇於一九七九年九月訪蘇。

曾於一九三五年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中作過報告，明白提出「中國共產黨應當竭力擴大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線」的陶里亞蒂<sup>18</sup>，到一九五六二月蘇共第廿次大會黑魯曉夫發動反史之後，他曾批評黑魯曉夫把蘇聯一切過錯都歸罪於史達林是不够的。他認為非常明顯的，一種制度容許史達林肆無忌憚地橫行，那種制度必然有問題<sup>19</sup>。當時，他和狄托一樣，指出史達林主義的存在，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問題。此外，他還提出過多中心論，不願恢復像共產國際那樣由蘇共一元領導的國際中心。

本來，義共一直是歐洲國家中最大的共黨，從一九四三年發展到一九四八年，其黨員曾經到達過二三〇萬人。其間，一九四六年選舉制憲會議代表，社會黨僅次於基民黨，爲第二大黨，共黨位於第三。因與共黨結盟，社會黨失去了主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後，社會黨與共黨分手，參加由基民黨領導的四黨聯合政府。義共在第一次莫洛（Aldo Moro）聯合內閣半途轉變政策，擬以共黨爲中心糾合包括基民黨內的革新勢力，構成「新的多數」，這是當時義共總書記隆哥（現任義共主席）的主張。但「歷史妥協」要等新的總書記貝林格來實現。貝林格於智利的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一九七三年九月其左翼政府垮台時深受刺激，他瞭解到一個政府的基礎，要比單純由左翼政府組成的聯合政府更爲廣闊、更少受攻擊，才能站得牢些，因此才製訂了「歷史妥協」的方案。

現今義共黨員一七〇萬，一九七六年六月大選後，義共成爲第二大黨，乃積極作問鼎政權之準備。共黨認爲義大利不僅在經濟和社會結構方面有危機，在政府機構與機能方面也有危機。它自稱要謀求各民主政黨間忠誠合作，尤其是幾個大黨間的合作，

註<sup>18</sup> 陶里亞蒂當時名 P. Teyiatti，第七次大會根據他的報告，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廿日通過「帝國主義準備新的世界大戰與共產國際底任務」決議。

註<sup>19</sup> 「歐洲共產主義之意義與緣起」。

因此自一九七六年六月以降，它就以「棄權」方式支持基民黨。它自認是由於共產黨及其他黨派未投票，基民黨政府才不致倒台<sup>(20)</sup>。但義共只把當前階段看作過渡時期，即使說不上以退為進，至少也是採漸進政策，在人民中間創造較好的印象和較高的聲望，為將來自己執政奠立基礎。這樣的政策未必能使溫和派滿足，却易招致急進派反對，即在義共黨內亦復如是。

突出的代表性事件，是基民黨魁莫洛的遭受殺害。這位五度出任總理的政治家有一項構想，要把西歐最大共黨之義共，納入西方議會民主主義的範圍內，讓它蛻變成穩健的政黨，貝林格的「歷史妥協」路線，乃至歐洲共產主義的誕生，莫洛實已助其一臂之力。莫洛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六日遭「赤軍旅」綁架，五月九日其遺體在羅馬市內發現。這個「赤軍旅」和不願見共產黨成為執政者的友黨的國際組織有聯繫。據稱其綁架的第一目標原為貝林格，因貝林格警衛森嚴、無機下手，才綁架了第二目標與「歷史妥協」和歐共主義有關的莫洛。他們組織「人民法庭」審判莫洛，指他為無產階級的敵人而判處死刑，然後以他的生命交換被監禁的十三名恐怖份子。政府不肯接受勒索，莫洛終於被殺慘死。此一事件對義大利人民衝擊頗重，其影響久久不能消除。

義共基於「歷史妥協」而支持基民黨政權，其結果未如其理想，乃於一九七九年二月撤回其對基民黨的支持，使安德瑞奧蒂(Giulio Andreotti)政府，不得不於六月三、四日舉行大選。而義共更在大選之前，於三月底至四月初召開第十五次大會，為選舉預作準備。然六月選舉結果，義共却出乎意料的失敗。選舉後各黨所獲議會席位如左：

	參 議 院		衆 議 院	
	一九七六	一九七九	一九七六	一九七九
基 民 黨	一三五	一三八	二六三	二六二
共 產 黨	一二七	一〇九	二三八	二〇一
社 會 黨	二九	三二	五七	六二
義大利社會運動 社會民主黨	一五	一三	三五	三〇
社 會 共 和 党	六二	二六	九	一六
自 由 党	二五	四五	一四	一八
急 進 党	九	一九	一九	一八
其 他	三〇	二〇	六二	三〇

在參衆兩院，共黨痛失廿七席，以得票率言，參議院由百分之三三·八，降至百分之三一·五；衆議院由百分之三四·四，降至百分之三〇·九。這是自一九四八年以來，義共在選舉中的大失敗。六月十六日夜，羅馬的義共總部且遭受極右派的炸彈攻擊！然選舉後，義共仍然執行歐共主義路線。

## 九

歐洲共黨對於歐洲共同體(EC)的擴大及預定於一九七九年六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的立場，早已四分五裂。一九七八年下半年，愛爾蘭共黨已決定杯葛歐洲議會的直接選舉，英國、丹麥共黨擬迫本國政府脫離EC，義共原則支持直接選舉制，荷蘭左翼更積極贊成。對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三國之加入EC，各國共黨也因利害不一而各守自己的立場。法共因恐新成員加入，使地中

註(20) 「義共看義大利危機」。

海國家的廉價農產品大量流入EC區內，將使法國農業破產而持反對立場。法、西共黨會爲此一問題互相抨擊。一九七八年六月底，季斯卡總統訪問馬德里，卡里略曾與其會談，並要求季氏支持西班牙加入EC。同年九月底馬歇在法共中央全會聲言，法共將固守法國的國家利益，阻止西班牙加盟。義共認爲義大利的危機，不可能在義大利國內、而必須在EC之內解決，亦與法共立場不同。又義共早已聲言俟其當政後，義大利仍然要留在北約之內，法共對北約的立場則與義共有異。

義共的十五次大會和法共的廿三次大會，都仍維持多黨體制的主張，兩黨都主張應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其他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並列。又前此未曾公式化的「歐洲共產主義」一詞，也予以公式化。惟義共十五大中，確定歐洲共產主義是「第三條道路」，它是在「全面擴大民主主義和一切自由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並稱，基於此一信念，西歐和日本的共黨才選擇了歐洲共產主義。這和前述馬歇對歐洲共產主義的評價頗有差異。現今義、西共仍堅持脫離蘇共而自主的原則，法共却已向莫斯科微笑！以下讓我們歸納爲幾點，作爲本文的結束。

什麼是歐洲共產主義？它是否存在呢？我們頗肯定歐洲共產主義的存在，但也贊成克蘭克紹氏的說法：歐洲共產主義必須不斷求改變，否則便會瓦解<sup>(2)</sup>。因此，除前述種種外，它將來也許會有新的口號提出或新的色彩展現。

它會變成民主政黨嗎？雷威爾說：「即使西方共黨與莫斯科公開決裂（有此可能），它們也不會變成民主的政黨。非俄並非就是民主」<sup>(2)</sup>。我們同意這種說法。一九七六年九月廿日，貝林格在那不勒斯大會中說過：「共黨絕不會成爲社會民主黨」。法共、西共亦復如是。

歐共主義者和蘇聯的關係究竟如何？義大利社會運動（MSI）書記長阿米蘭特（Giorgio Almirante）曾經說：「歐洲共產主義的企圖是中立歐洲，實際就是使歐洲芬蘭化。貝林格總書記是木馬屠城記中所望塵莫及的最大木馬」。這話也許太露骨了一點。我們承認歐共與蘇聯之間，存有某些歧見，惟若歐共一旦當政，遭遇到國際政治中須在西方與蘇聯之間二者擇一而又非直接涉及其本身利害時，它會毫不遲疑地選擇蘇聯，殆無疑義。

歐洲共產主義能够繼續存在嗎？一位EC的官員說：「在歐洲既不極端傾向美國，也不與蘇聯作戲劇性訛別的限度內，南歐的歐洲共產主義是仍然可以存續的」。事實上，共黨的存在與發展並非單純由其主觀條件決定，它的長處在迎合對方幻想而施以欺騙，在敵人的錯誤行動中檢取便宜。明乎此，再去回味那位EC官員的話，便可領悟它含義的深遠了。

註<sup>(2)</sup> 「歐洲共產主義之意義與緣起」。  
「歐洲共產主義的神話」。